

黑白五千年

——中国的围棋文化

胡 方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棋史篇

- 一、尧、舜造棋：围棋的起源
——围棋的起源…………… (3)
- 二、三尺之局战斗场
——两汉、三国时代的围棋…………… (9)
- 三、“坐隐”、“手谈”
——两晋南北朝的围棋…………… (16)
- 四、忘忧清乐在枰棋
唐宋的围棋…………… (24)
- 五、横绝四海，而无人争
——元明清的围棋…………… (32)

棋人篇

- 六、龙戏棋枰，虎步中原
帝王与围棋…………… (41)
- 七、何处仙人爱手谈，一枰玉子敲云碎
神仙棋手…………… (47)
- 八、新样梳妆巧画眉，小阁幽窗静弈棋

历史上的女棋手.....	(53)
九、高处不胜寒	
中国围棋的最高手.....	(60)

棋文篇

十、百草芬芳，不知柯烂几夕阳	
围棋与传说.....	(69)
十一、清簾疏帘看弈棋	
围棋与唐诗.....	(75)
十二、一窗暖日棋声里	
围棋与宋诗.....	(81)
十三、围棋斗白黑	
围棋与古典戏剧、小说.....	(90)
十四、棋枰上的文化遗迹	
古代围棋记谱法.....	(97)

棋史篇

一、尧、舜造棋

——围棋的起源

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智力竞技活动，它的规则非常简单，但黑白两色棋子纵横于十九路棋盘的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上可以衍生出无数种变化。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作过一次计算：“其法初一路可变三局，自后不以横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数。”这里运用的是数学的排列组合理论：棋盘上的每个交叉点都有放黑子、白子或不放子三种可能，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就有 3^{361} 种可能，即约 1×10^{172} 种可能，而且这还不算对局中出现“打劫”的情形。唐代的冯贽感慨道：“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云仙杂记》）。北宋张拟的《棋经十三篇》也说：“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正是这种规则的简单性和变化的复杂性使围棋风靡古今中外，也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的一门传统艺术，从唐代开始，国人就将“琴棋书画”并举。

但是，围棋究竟源于何时？这一直是我国围棋界和史学界的一大疑案。

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源自西晋张华的《博

物志》：“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清人张澍辑录的秦汉文献《世本·作篇》：“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说法略有差异。案《世本》原是战国时期各国史书的合本，成书于当时，《史记》等许多古书都引用过它，其比《博物志》的记载早了许多。张华大概也是读过此书的，因为据明张岱的《琅嬛文集》记载张华是读过许多上古秘籍的，因此晋武帝问他汉代宫室制度，他应对如流，在历史上他是个博闻强识的才子。但有人以《世本》仅说“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而未提“以教子丹朱”认为尧因教子而造围棋是张华的牵强附会之说，我们认为不能以此定论，因为张华可能看到过我们不曾见过的文献材料。丹朱是历史上有名的不肖之子，宋人罗泌在他所撰的上古史《路史·后记》中将这一故事演绎得更加生动：“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翬很媚克。兄弟为闾器讼；嫖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据说，也正因为此，故尧不传位子丹朱，而禅让与舜。

我们认为，远古史事本就不易考证，姑就有关记载“妄而言之”，以备一说，读者聊当传说即可，不必细究。而且此说影响极大，就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据此断言围棋诞生于公元前 2356 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四大棋派掌门人本因坊道知、井上因碩、安井仙角、林门也均信此说。

其实，古人也曾怀疑过“尧造围棋”的说法，如唐代著名文人皮日休就认为尧是不会去造围棋的（《原弈》）。皮日休的理由是：儒家主张仁政、崇尚文德，“夫尧之有仁、义、礼、智、信，性也。”尧时三苗（少数民族部落）不服统治，然而“尧不忍加兵……”而围棋，在皮日休看来是“害、诈、争、伪”之道，因此，尧是不可能去造围棋的。那是谁造的呢？皮日休认为：“则弈之

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而且，皮日休还为尧大喊冤枉：“岂曰尧哉！岂曰尧哉！”

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出发，皮日休的论证不免有太过偏颇之嫌，但在古代，这种论调是很有市场的，因为它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思维逻辑，且古人常以战争比拟围棋。

与这种严肃的面孔相反，有人发挥想象，认为围棋是神仙发明的。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说：“围棋初非人间之事，始出于巴邛之桔，周穆王之墓，继出于石室，又见于商山，乃仙家养性乐道之具。”更有人将神仙与尧联系起来，两个故事串在一起，讲得有鼻子有眼：尧子丹朱不肖，有一天尧来到汾水之滨，看到有两个仙人对坐在翠桧树下，划沙为棋盘，正在围棋，尧就上去求问教诲丹朱的方法，一仙就说：“丹朱善争而愚，当投其所好，以闲其情，指沙道石子，此谓弈枰，亦名围棋，局方而静，棋圆而动，以法天地，自立此戏，世无解者。”（《历代神仙通鉴》）。而后，尧教子围棋后，丹朱天天下棋，在快乐中性情也渐渐闲静下来了。

关于围棋起源的第四种说法是“乌曹造围棋”，如明人《潜确类书》：“乌曹作赌博、围棋。”这种说法较为晚出，多见于明、清类书，除上所引，又如明董斯张《广博物志》、清张英《渊鉴类函》等书皆有所提到。清末黄俊编撰的《弈人传》中说：“乌曹，商人。《古史考》：乌曹作瓦器。……《物原》：桀臣乌曹作赌博围棋……”其实，乌曹的事迹，最早见于《世本·作篇》，但只云“乌曹作博”，并未提到他也发明了围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籀，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籀。”这里的博（或写作籀）是指“六博”，这是古人的另一种游戏，与围棋是两码事。但据扬雄《方言》中所说，当时有些地区将博“谓之棊（即

棋字),”古人也常将“博弈”并举,因此,“乌曹造围棋”的说法大概是明清人对古籍的一种误解。

上面讲了许多流行的对围棋起源问题的说法,不管它们的可信程度为多少,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围棋很早就起源了。下面我们再从较为可靠的早期文献、史料中作些考证、说明。

据《左传》记载,春秋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卫献公召见上卿孙林父、亚卿宁殖时未换下猎服,两人感到受了侮辱,共同发动宫廷政变,迎立殇公为君,献公逃到了齐国。十二年后,宁殖的儿子宁喜当了左相,与孙“争宠相恶,”于是答应迎献公回国复位,大夫大叔仪闻知此事,感叹说:“宁氏对待国君的态度太轻率了,比下围棋还不如。下棋的人举起棋子,犹豫拿不定主意,就不能战胜对手,何况在迎立的大事上如此反复不定。宁喜一定会失败的!”果然,宁喜在毒死殇公、迎还献公后不久便被献公借故杀害了。这段故事,给后人留下了一则著名的成语:“举棋不定”。

这段话不是直接讲围棋的,但从侧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春秋时期,围棋已经相当流行了。因为人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已经用围棋作喻了,大家知道,在交谈时用来作比拟的东西必定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事物,否则听话者不知你所云何物,比喻便失去意义了。

这段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时的人对围棋本身没有褒贬。就连孔老夫子在《论语·阳货》中也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吃饱喝足了,整天不动脑筋是太不象话了,这种人还不如去玩玩六博、围棋,也比无所事事好些。

但当博弈过度时，就要受到圣人的批评了。战国时代的孟子所批评的“五不孝”中就包括博弈过度这一条，见《孟子·离娄下》：“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这里也拆射出当时世态风气：有些年轻人终日博弈，不顾父母家庭，我想当时人们对于博弈之道的迷恋不会亚于今日青少年对电子游戏的迷恋程度，否则，孟老夫子也不会板着面孔将之定为第二大“不孝”。

但是，孟子本人对于围棋本身也不是那么深恶痛绝的，相反，他在文中还记载了当时弈术最高的一位棋手秋。《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唯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欤？曰：非然也。”可见，孟子虽然认为围棋是小玩意儿，但不花些工夫，专心为之也是学不好的，并以此教诲世人学习事物要专心致志，不能经常开小差。这里，孟子对围棋没有太多的贬低之意。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在先秦时代围棋已在民间流行了，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围棋在人们眼中仅是一种游戏而已，与博戏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不象发展到后世，围棋被赋予了文化意义，成为文人学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门艺术。而且，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看来，先秦时期六博之术的流行程度远远高于围棋，各国的君王大臣、平民百姓无不染指浸淫。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人们棋艺不高，并未发现围棋真正迷人之处，所以都觉得不如玩六博有劲。而古人“博

弈”并举也提示我们：这两种古老的游戏在起源上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可惜我们找不到更多的文献材料了，这一点只能存疑了。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讲，“博”是荒淫无道的商代君主武乙发明的作乐之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论：围棋必定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有闲阶级发明的消闲作乐的一种游戏。

二、三尺之局战斗场

——两汉、三国时代的围棋

围棋在先秦时代一般都叫做“弈”，从汉代开始才逐渐成为这一棋种正式的名字。杨雄《法言·问道篇》：“围棋击剑，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刘向的《淮南子》中也有类似说法。许慎《说文解字》：“弈，围棋也。”扬雄《方言》进而告诉我们这里有方言差异：“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班固《弈旨》也说：“北方之人，谓棋为弈。”后来，唐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疏云：“棋者所执之子，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可谓一语道破：围是“弈”的本质所在，因此，即使是在单音节词占主导地位的汉代，“围棋”这个双音节词还是代替了“弈”这个名称。

围棋以黑白两色棋子围杀争胜的游戏规则古今未易，但棋盘的道数却有一个发展稳定的过程。据1954年河北望都汉墓出土的十七道石制棋盘推论，东汉已经流行十七道棋盘了。1974年新疆吐鲁番唐墓内出土的仕女图中的棋盘也是十七道。但1971年在湖南湘阴唐墓内找到的棋盘却是十五道。1977年内蒙古辽代古墓内发掘出来的棋盘甚至只有十三道。

迄今所见最早的十九路棋盘是195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瓷棋盘。从文献看，三国魏人邯郸淳《艺经》上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南朝《读曲歌》中也有“方局十七道”之类的辞句。因此，现代棋史界一般都认为汉代十七路棋盘是主流，而唐代开始则一般皆通行十九路棋盘了。至于同一时代有多种棋盘，也许是因为地域差异或个人喜好之不同，就象现在一般通行十九路棋盘，但尼泊尔、锡金和西藏等地区还流行十七路棋盘一样。但实践证明，十九路棋盘是最科学的，至于原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从行棋的取实地与取外势两方面的效率与棋盘大小的关系方面去思考，这里便不再枝衍了。

爱好围棋的都知道，与现代围棋相比，中国古代围棋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对局时双方先各在四角的星位上放上二子，称为“势子。”这种制度一直沿续到清末。但是，汉代的围棋是否也是如此的呢？东汉马融《围棋赋》中的一句话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横行乱阵兮，敌心骇惶；迫兼棋骹兮，颇弃其装。”这个“骹”字不载于当时的字书，文献典籍上好象也仅见于此，《康熙字典》虽有该字，但形声皆不可晓。宋章樵注云：“骹，音义与岳同。棋心并四角各有一子，谓之五岳，言不能动摇也。”明人杨慎在《转注古音》中曾引章樵上文，并增“今谓之势子，而中心一子不下。”后人由于不解“骹”这个僻字，因此众说纷纭，或以为其为“骹（即鹑字）”字之误，或以为“難（即鹑）”字之误。但是，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不管这个“骹”是什么字，所谓的“棋骹”是指“棋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元”，因为它位于棋盘最中心，故称之为“心”。这可从晋人蔡洪的《围棋赋》中找到旁证：“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

岳。”后句就是指在天元下子。接下来的问题是，天元上一子谁下？按古代着法白先黑后，好象应该是白下天元一子；但反过来一想，既然五子均为势子，那么天元放黑子，开局不是白先了吗？而随着天元这一势子的消失，后代也就白先行，不正是沿袭此制，前后一贯吗？但由于没有文献记载，也只能存疑了。

据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载，汉代开国之君刘邦，经常在宫中与戚夫人“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但从有关材料看，西汉围棋并不很兴盛。《西京杂记》说，西汉棋下得最好的是杜夫子：“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另据班固《汉书·陈遵传》载，杜夫子的同乡陈遂，汉宣帝未即位时与他交情不错，常在一起玩玩六博，下下围棋，宣帝常输，这样就欠了陈遵不少钱。后来，等宣帝正式做了皇帝，就重用他，封他做太原太守，并风趣地对他说：高官厚禄，够还你的旧债了吧！

从这两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围棋并不是很重视，而且博弈还未彻底分家。这从史料上可得到证实。《汉书》中记载了西汉大儒贾谊的抨击之辞：“失礼迷风，围棋是也。”史游的《急就篇》也说：“棋局博戏相易轻。”意思是，凡是参加棋博游戏的人，由于有争斗之心，所以就容易言辞轻侮，举止不检点，失于教让。

所以，到了东汉，热爱围棋的人见到“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萧条场面，不由追问缘由，结果发现主要的问题在于“弈义不述，问之论家，师不能说。”（《弈旨》）。即理论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要提到的是班固的《弈旨》，这是历史上第一篇系统地论述围棋理论的著作。文章立意很高：“局必方正，象地则

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说明围棋是“道之正也”。接下来，具体分析了弈与博的本质区别：“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而“弈则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级。”指出弈高于博的地方。最后说明下围棋可以修身养性，合乎圣贤教化。

其后，东汉著名的反对谶纬之学的学者桓谭作《新论》，对围棋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速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野，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这里，桓谭不仅将围棋理论与兵法理论归为一类，而且指出了对局战略的高下：上者控制大局，不战而胜；中者扭断对攻，需战罢计数；下者委屈求活，从现代理论讲，即便活了一小块地但被人得了外势，多半会输。这是深得围棋三昧之言。上文提到过的马融《围棋赋》云：“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也以用兵比围棋，这是汉代以降围棋精神之核心。“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著《弈势》，全篇引述了春秋至三国的一些重大战争和军事战例，如背水一战、声东击西、昆阳之战、官渡之战等，以阐述围棋之战略精神。古人的这种理解把握住了围棋之实质，也提高了它的地位，而且对后世影响很大，《隋书·经籍志》中便将围棋书籍归入“兵法”一类。

东汉另一位有朴素唯物论精神的思想家黄宪在《机论》中指出：“弈以机胜，以不机败。”而且不光下棋，一切社会活动均贯穿着一个“机”字。掌握机心就是掌握事物内在规律。以此鼓励人们下棋时积极用智。

正是有这许多理论之支持，东汉末至三国，围棋才真正得以发展了。四百年后，沈约在《棋品序》中回顾往事，由衷地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战事不绝，而三尺棋枰之上也演绎了不少精彩绝伦的争斗，给后人留下不少值得品味的棋话。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太祖曹操便是当时围棋好手，与关中的围棋名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人皆能抗衡。（见《太祖纪》注引《博物志》）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又从安徽亳县曹操祖父曹腾墓内找到了石制围棋，可见围棋是曹家的一大娱乐传统。曹操子嗣很多，兄弟之间“相煎”颇急。长子曹丕虽已受汉禅为魏文帝，但他心眼儿小，忌弟任城王曹彰骁壮勇猛，便设计害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棋局上：曹丕找弟弟在他们的生母毛太后处下棋，但他事先在部分枣子中下了毒，对局时他专拣无毒的吃，但曹彰不知道，中了毒。毛太后就去打水想给儿子解毒，但所有的瓶罐事先早被曹丕命人毁坏了，于是，曹彰一会儿便死了（见《事说新语·尤悔篇》）

曹家爱下棋，其手下臣僚弈风也颇盛。据《魏书·明帝纪》，曹操手下的孔桂因“晓博弈踰阡，故太祖爱之。”平常出入，曹操总把他带在身边。而在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当中也不乏围棋爱好者。除上文提到的应玚著有《弈势》外，王粲著有《围棋赋序》。而且，据《魏书·王粲传》记载：王粲看人下棋，不料棋盘被人碰翻了，王粲便为他们复局，但下棋的人不信他摆的和原来一样，就拿手帕遮住棋局，另拿一个棋盘让他再摆一次，结果“不误一道”，这在当时传为佳话。孔融给人写信时曾以围棋作喻（《与邴原书》），《红楼梦》中的惜春研究过他的棋谱，想必他也是位围棋好手。虽然我们现在找不到关于他与人